

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

杨洪升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诏征集天下藏书,后又接受朱筠建议从《永乐大典》中搜辑遗书,最终发展为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天下藏书辐辏于翰林院与武英殿,许多埋没已久的遗籍展现于学者面前。尽管《四库》纂修工程巨大,日程紧迫,但在公务之余,馆臣中的一些嗜古绩学之士乘职务之便,纷纷私下据馆书录副、校勘,乃至利用馆书私为撰著,乾嘉学风之养成及兴盛,于此可窥一斑。

一、抄校馆书考

1. 总裁

总裁是四库馆的最高职务,总揽《全书》的编纂。总裁中最为好古的当推彭元瑞。彭氏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办四库馆副总裁差,四十八年充副总裁。今经眼其从四库馆录副之书有:《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彭氏乾隆五十五年春手跋^①,今藏上海图书馆;《庆元党禁》一卷,彭氏乾隆四十九年抄校并跋^②,今藏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江淮异人录》二卷,彭氏乾隆五十三年仲秋五日手跋^③,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另考其从四库馆抄校之书有《盘洲文集》八十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NKZXA10021)成果。

① 彭元瑞手校该书并跋云:“《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幸抄存此本,不可废也。庚戌春,云楣记。”详见下文征引。

② 彭氏手跋云:“《庆元党禁》,《宋史·艺文志》、马氏《经籍考》俱不著录,乃四库全书馆从《大典》辑出。甲辰闰三月钞校,芸楣。”

③ 彭元瑞手跋云:“此从《永乐大典》散篇辑,非旧本也,钞备《五代史记注》,内李梦符、李胜、司马郊、刘同圭、干大、洪州书生,可入吾郡志书。戊申仲秋五日,云楣。”按,戊申系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书未入《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彭氏必系从四库馆录副。

卷^①，《东家杂记》二卷^②，见《知圣道斋读书跋尾》。此外，上海图书馆今藏彭元瑞校跋之清抄本《大金集礼》四十卷，系据四库馆本校勘^③。

2. 总纂

总纂负责各书的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总纂中最为嗜古的是纪昀，其曾在四库馆录出《燕丹子》三卷，后赠与孙星衍^④；又录出《宝刻类编》八卷，赠与李文藻^⑤。

总纂陆锡熊也曾于四库馆录副。四库馆开，陆锡熊曾献书数十种，其中《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二十一种，当亦系富藏书者，然其藏书事迹今多湮灭无闻。今仅见其从四库馆录副元张宪《玉笥集》一种，今藏南京图书馆，陆氏手跋^⑥。

3. 《总目》协勘官

《总目》协勘官协助总纂官编定《总目》。程晋芳在乾隆三十八年春被特荐入四库馆司纂修，曾任《总目》协勘官、武英殿分校等。程氏“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⑦。其友周广业云：“先生笃志经籍，投老孜孜，家本足书，及校

①《知圣道斋读书跋尾》（清嘉庆间刊本）卷二载该书彭元瑞跋云：“是书世不多见，从馆中稿本录出，乃内府天禄琳琅所藏虞山毛氏影宋抄本也。”按，彭氏所谓“稿本”，当指馆臣校定《四库全书》底稿本。《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著录为浙江巡抚采进本，而提要及该书文渊阁本卷首提要均称“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藏，犹从宋刻影写”。检《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清乾隆四十年浙江刊本）浙江采进者乃知不足斋影宋写本，而《天禄琳琅书目》亦载有虞山毛氏影宋钞本。又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亦收录该书，系据内府藏毛氏影宋本。该书《四库》底本究竟系浙江采进本还是天禄琳琅藏本，姑且不论，彭氏没有参加《荟要》的编纂，其据以录副的当系《四库》底稿本。

②《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卷一《东家杂记》条云：“此南宗孔氏之书也……馆中副本，尚是宋槧，辄仿其行款抄之。”所谓馆中副本，当系四库馆中的进呈副本，彭氏据以录副。当时各省进呈遗书，为避重复，先进书目，供馆臣裁取，但后各省实际进呈之书重复者仍不鲜见。

③彭跋云：“余藏此书十年，暇日以《金史》对勘，又借馆本、马氏丛书楼本校定……又间录《礼志》之可以补其所未备者，前后校三过，庶几此书善本矣。乾隆甲辰孟秋朔，陪祀归邸记。元瑞。”按，乾隆甲辰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彭氏所谓馆本，当即四库馆之采进本。

④孙星衍《燕丹子叙》（《燕丹子》卷首，清嘉庆十一年《平津馆丛书》刊本）云：“《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既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据此可知，纪昀于四库馆录该书副本赠孙氏。

⑤李文藻手跋该书云：“《宝刻类编》八卷，近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八月中，余师直阁纪晓岚先生钞以见贻……乾隆丁酉十一月十九日，益都李文藻记于全州舟次。”（缪荃孙等撰，吴格整理：《嘉业堂藏书志》《宝刻类编》条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

⑥陆氏手跋：“岁癸巳……因假四库官本，付楷书手疾写成帙，以归行笈，字迹潦草，愧不及原本之精楷也。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下浣云间陆锡熊识于宣南坊寓。”

⑦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首《皇清诰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加四级戴园程君墓志铭》，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程氏勉行堂刊本。

理《四库》，遇有秘册善本，靡不钞录。”^①其《勉行堂文集》内有书跋两卷，据以确考从四库馆录副者有宋王安石《周官新义》十六卷^②、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九十卷^③、元刘祁《归潜志》十四卷^④，又曾据黄登贤进呈本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校己藏本^⑤。此外，尚有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三十八卷，乃孔继涵代钞，出于孔氏抄四库馆鲍士恭进呈本^⑥。程氏亦曾代友人周篋谷、陈以纲录副《周官新义》^⑦。

4. 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

翁方纲与程晋芳同时入馆任事，曾充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等职。翁氏曾从四库馆传抄宋吕大临《考古图》十卷、《续考古图》五卷及《释

①周广业：《四部寓眼录》卷上《春秋左传翼疏》条，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虞罗振常蟬隐庐排印本。

②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清嘉庆二十五年程氏勉行堂刊本）卷五《周官新义跋》云：“《周官》旧二十二卷，此吾友周书沧从《永乐大典》录出者，得十六卷，而《地官》、《夏官》缺焉，未附《考工记》二卷……余与书沧、孔荭谷各钞一本，嗣是永清令周篋谷属钞一本，而陈上舍竹厂又钞焉。”

③《勉行堂文集》卷四《书春秋分记后》云：“始吾友赵诚夫为余言是书之佳，而极其难得……癸巳之春，设四库全书馆，马氏书大半进馆中，余乃得见之矣。亟命钞胥录之，三月而毕。覃溪学士亦钞焉。”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即马裕家藏本。

④《勉行堂文集》卷五《归潜志跋》云：“今外间所行《归潜志》钞本止八卷，此余从四库馆钞出者，得十四卷，与钱氏《敏求记》卷数合，盖完书也。”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即十四卷，鲍士恭家进呈本，此本殆从鲍氏进本出。

⑤《勉行堂文集》卷二《唐摭言后序》云：“《唐摭言》十五卷，其为嘉定宜春孙氏本，既无从知之，而视《稗海》所刊多十之五，盖为秀水朱竹垞借钞于梁相国棠村，王渔洋又借钞于竹垞，北平黄少宰崑圃为渔洋门下士，因得此本，德州卢雅雨又崑圃门生，遂为刊行。讎校未极精，与初本互有得失。余承乏《四库全书》纂修，得黄氏钞本对勘，存其一是。”按，《四库总目》著录“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程氏系据四库馆进呈本校。

⑥《勉行堂文集》卷五《舆地广记跋》云：“此丁酉秋同年孔荭谷为余钞者。吾友严冬友曾有是书，余欲借钞而未得，经七年后始得之。”孔继涵四库馆录副本民国间曾藏于湖州蒋汝藻家，《传书堂善本书志》（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74年）载有周梦棠手跋，述该书原委：“乙未冬，农部假抄两浙进本，出以属校，而未得暇也。今冬十月校《寰宇记》竟，姑从事焉……丙申十一月十六日有香周梦棠识于因居。”按，“农部”即孔继涵，“两浙进本”即鲍士恭家进呈本，见下文所考。以时间推断，孔氏为程晋芳代抄该书盖据己所录副本。

⑦前引程晋芳《周官新义跋》。

文》一卷^①；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九十卷^②；苏过《斜川集》六卷^③。另，翁氏曾据四库馆抄本校已藏《绛帖平》^④。

5.《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负责从《大典》中辑出并编定学术价值较高的佚籍。戴震与邵晋涵、周永年于乾隆三十八年七月被特旨荐入四库馆，三人均为绩学之士，入馆后均充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今考戴震在四库馆录副有《九章算术》九卷^⑤，《海岛算经》一卷^⑥。邵晋涵录副有《唐律疏议》三十卷^⑦、《大隐集》十卷^⑧，今均藏南京图书馆。此外，邵氏曾为鲍廷博录副宋张

①翁氏跋《考古图》多则，其一云：“此书仅得见馆写副本，或誊录手写多误，皆未可知也。其确可定者，方纲校勘之次，亦即改写，而其未改者极多。”又云：“昔人有云：‘书有误，宁改污，勿挖补。’方纲书虽不工，然钞写是书，窃存此意。”又一跋考《释文》一卷乃赵九成撰，末题“壬寅夏六月六日方纲识”（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壬寅乃乾隆四十七年（1782）。据此，翁方纲跋本乃其于四库馆手录副本无疑。

②前引程晋芳《春秋分纪书后》有云“覃溪学士亦钞焉”，“覃溪”系翁方纲之号。

③苏过《斜川集》（清乾隆五十三年亦生堂刻本）卷首赵怀玉序云：“乾隆辛丑冬，集大兴翁学士苏斋，修东坡先生生日之祀，学士手编示余曰：‘此叔党《斜川集》，从《永乐大典》录出，可以证诸牘本之非。’会急请南下，未及假钞，以为耿耿。”按，《斜川集》系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未收入《四库》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据此，翁氏录有该集副本。

④叶启发《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绛帖平》条载：“大兴翁氏传抄本《绛帖平》六卷，书中抄写误字均以朱笔校改，字法率更《化度》，知其为覃溪阁学手笔也……有阁学题字云：‘书须时时检阅考核，不可轻易借出以荒功力，乙未七月二十八日灯下识。’又云：‘辛丑正月六日以官抄本校勘一遍，止有六卷’……辛丑为四十六年，阁学年四十九岁，《四库全书》尚未藏事，阁学仍在馆中，更以《全书》底本重校一遍。所称官抄本，即《四库》抄本也。”

⑤戴震《刊九章算术序》云：“余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拟《永乐大典》或尝录入，书在翰林院中。丁亥岁因吾乡曹编修往一观……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躬逢国家盛典，乃得尽心纂次，订其讹舛，审知刘徽所注，旧有图而今阙者补之。书既进，圣天子命即刊行。”又云：“吾友屈君鲁传亦好是学，愿得《九章》刊之，从余录一本。今秋之仲，曲阜孔君体生访求得算书若干卷，系毛氏宸影摹宋刻者……余急假之孔君，独《九章》卷六以后阙，因更校数字以寄君。”（《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页）

⑥《海岛算经》（清乾隆中孔继涵刊《微波榭丛书》本）卷末戴震跋云：“其书世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今哀而辑之，仍为一卷。”孔继涵跋云：“余既假戴君东原本，归于《算经十书》中，乃记之。”据此可知戴震从《大典》辑出此书并录有副本。

⑦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刊本）卷十三《唐律疏议》条载该书旧抄本云：“此则徐姚邵晋涵为文渊阁校理时所录，有‘文渊阁校理邵氏二云印’。”按，此书甚罕见，《勉行堂文集》卷五载程晋芳《唐律疏议跋》云：“求其书二十年不可得，最后始于四库馆见之。”此本当系邵氏从四库馆中所录。

⑧《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九《大隐集》条载该书旧抄本云：“今四库馆辑自《大典》者，为文六卷、诗四卷，有‘晋涵之印’、‘邵氏二云’两印，盖二云在馆时所钞也。”

铤《南湖集》十卷^①。周永年录副有《斜川集》，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②；《周官新义》^③。此外，周氏曾为鲍廷博抄录《金楼子》一部^④。据桂馥云，周永年又曾借馆中书属桂氏为《四部考》，“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⑤。

邹炳泰系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即入四库馆充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邹氏于《永乐大典》辑佚贡献甚大，著名的《直斋书录解题》即出其手。其在四库馆录副颇多，今确考者有《唐才子传》八卷^⑥、《慧山记》二卷^⑦、《苏氏演义》十卷^⑧、《溪堂集》二卷^⑨。

6. 武英殿分校官

武英殿分校官负责查校誊录各员缮写之书。祝瑩于乾隆四十二年前后入

①《南湖集》（清乾隆四十六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首鲍廷博《刻南湖集缘起》云：“张助教潜亭入都，曾以搜求未备为托。阅岁书来，以馆中新得《南湖集》见报，未几，助教忽归道山，继而邵太史二云闻之，赴官之后，亟求馆中校定副本传抄一编。适沈侍御芦南归，寄以相示。”

②台湾“国家图书馆”今藏周氏林汲山房钞本《斜川集》，内有邓邦述跋云：“封面有林汲山房传抄字，林汲为山东周书昌先生斋名，与邵二云同在史馆，同辑《永乐大典》，一时竞写未见之书。”按，此书即系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此本当系其于四库馆录副之本。

③前程晋芳部分《周官新义》条注文引程晋芳《周官新义跋》有云“余与书沧、孔荭谷各钞一本”，书沧即周永年。周永年，字书昌，一作书沧。

④《金楼子》（清乾隆间《知不足斋丛书》刊本）卷末汪辉祖《书金楼子后》云：“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赍达以文，相与忻幸久之。”

⑤桂馥：《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孔宪彝刻本。

⑥邹炳泰《午风堂丛谈》（清光绪间常州盛氏刊《常州先哲遗书》本）卷七载：“《杨东里集》载《唐才子传》……《永乐大典》载此书，尚存二百七十八人，辑成八卷……余录得一本藏之。”

⑦《午风堂丛谈》卷一载：“黄孝存蛟起《西神丛语》载吾邑正统中释觉性撰《慧山志》，景泰中释圆显《慧山记》十卷，成化中邵二泉、潘玉林两先生《惠山志》六十卷，至崇祯中谈高祐撰《锡山别考》……右求之藏书家，俱无之。惟邵二泉《慧山记》从江省采进遗书内抄得上下二卷，与黄所载卷帙不合，当博访以广旧闻。”考各家进呈书目，进呈此书者唯有两淮马裕一家，三卷，一本，当即邹氏所云“江省采进遗书”，此书明正德刊本即三卷，马氏所进当即此本，此处作“上下二卷”，恐有误。

⑧《午风堂丛谈》卷三载：“唐苏鹗《演义》……余从《大典》中录出十卷，藏之。”

⑨《午风堂丛谈》卷三载：“余从《永乐大典》纂辑谢无逸《溪堂集》二卷……余既得《溪堂集》，越岁复得唐子畏《满城风雨近重阳》画卷，因备录二谢诗于卷后。”

馆任职,曾负责查校《四库全书总目》及《简明目录》等职^①。祝氏曾从馆中录副《芦浦笔记》十卷,后丁杰又借抄祝本^②。

冯敏昌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四十六年散馆入四库馆任分校。冯氏曾被派校《明儒言行录》,乃典衣节食,雇书手录副^③。

沈叔埏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后入四库馆充武英殿分校。钱仪吉云:“会朝廷屡举特科,复诏求遗书于天下,东南故家奇文僻籍往往间出。先生多从甄录,或者勾借手钞,寒暑不辍,储藏之富,几与曝书亭八万卷著录相埒。”^④可见其嗜书成性。其《颐綵堂文集》卷八至卷十一所载多为书跋,臆其中从四库馆录副者不下二十种,然除宋毛滂《东堂集》^⑤、《都官集》^⑥外多未明言,未识何

①《质郡王永琿等奏刘权之协同校办〈简明目录〉可否遇缺补用片》云:“查上年《全书总目提要》全部告成……又查校官祝堃一员,由中书中式进士,改授庶吉士,前后在馆六年,历经派办《总目》及《简明目录》,行走亦属勤奋,可否一并准其照例授职之处,均出自圣恩。”(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04页)

②《芦浦笔记》(清嘉庆三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载祝堃识语云:“案是书所载地理故迹……乾隆己亥重午前二日校官书,借抄毕附识。祝堃。”又载丁杰识语云:“己亥秋仲祝中翰堃本钞。其元本当系祁门马氏所进,故有樊榭山民跋。”按,检《进呈书目》,此书据录之原本并非马裕所进呈,当系两淮盐政李进呈而总商搜访者,丁氏盖以厉鹗曾馆于马裕家而误作此推测。此书原进呈本系旧写本,后从翰林院流出,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卷八载之,并录厉鹗跋语(第592页)。

③《明儒言行录》冯氏手跋云:“右《明儒言行录》十卷,因分校四库书,派校此部,遂于校时随手摘录数百条,以便观省,后因原书未全,究为缺略,因雇书手写成此部,将存家塾,使我子弟他时各得批读,以为入道之门,其益当为不少,故不惜典衣节食抄成此书也。校官本时系壬寅七月上旬,迄今此书抄成并书于后为十二月十日,鱼山冯伯子记。”(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引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

④钱仪吉:《序》,沈叔埏《颐綵堂诗钞》卷首,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秀水沈氏刊本。

⑤沈叔埏《颐綵堂文集》(清嘉庆二十三年秀水沈氏刊本)卷九《书东堂集后》云:“余既钞自《大典》,为补《向应山祷雨》五古一首,附以坡诗《铜山寺》七绝一首,并附后人诗记,以资参考;又补入《暮山溪词序》一篇,《月波楼记》、《寒穴铭》各一首;并毛刊《六十家词》而别为附录一卷,共十三卷,仍符陈氏《解题》之数云。”按,此书未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本作十卷,《向应山祷雨》等亦未收入,沈氏所跋十三卷本当系己藏之钞本。

⑥《颐綵堂文集》卷九《书都官集后》云:“集三十卷,居士埒周开祖邠所辑,曾孙杞曾刊于四明,久佚不传。乾隆辛丑冬,余从《大典》钞得,仅十四卷,因取一时赠答哀挽诸篇并后人怀古之作悉附焉。”

故。此外又考见沈氏从四库馆录副《老圃集》二卷^①。

赵怀玉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充武英殿分校^②,其从四库馆录副之书最具盛名者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③,并于乾隆四十九年据以刊板,该书乃得广泛流传。此外,尤巨者尚有《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④,《蓝山集》六卷^⑤。

7.提调

提调负责提取翰林院、武英殿书籍等事。法式善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进士第,旋充武英殿分校;四十六年散馆授职检讨,帮办清秘堂事,充提调;五十二年充文渊阁详校官,十年间三役其事^⑥。《存素堂文集》称其间所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多系于四库馆录副^⑦。《陶庐杂录》则载其在充翰林院提调期间录得《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风雅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乾坤正气集》十

①知不足斋抄本《老圃集》有鲍廷博跋:“乾隆己酉孟冬传沈比部叔埏本,并校。”又跋:“乾隆乙卯八月初四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恭校。”(《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引录,第1008页)按,此书传世只有《大典》辑本,但没有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己酉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南三阁本尚在缮校之中,沈氏之本当系从四库馆录副者。

②赵怀玉:《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卷上,清嘉庆、道光间刊《亦有生斋集》本。

③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七《钦定四库简明书目跋》云:“臣怀玉幸预分校之役,尝就全书处恭录副墨以归。东南士林,借钞接踵,时恐不给。臣德舆、臣廷博并以书籍经进,上邀宠赉,爰其悉心讎勘,敬畀剞劂。”

④《亦有生斋集文》卷二《徐氏五代史补注残本序》云:“四库馆开,在事诸臣得《永乐大典》所引薛史,甄综条系,排纂先后,又考宋人书之征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依原书卷数勒成一编……余时司分校之役,亟录其副而藏焉。”

⑤该书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卷末有赵氏朱笔题记云:“《永乐大典》中误收润诗五十馀首,今改正,因记之。”又该书卷一首行下题“录永乐大典本”,第三行下题“赵怀玉校抄”。据以知之。

⑥阮元:《梧门先生年谱》,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⑦法式善《存素堂文集》(清嘉庆十二年绩溪程氏扬州刊本)卷二《宋元人集钞存序》:“宋元人集,明初所流传益多,至今日不可得见。乾隆三十七年诏开四库书馆,各省疆吏所搜采,江浙藏书家所献纳,以及绅士词臣所进,殊寥寥焉。继以故朱学士筠奏请就《永乐大典》各韵采缀成书,而宋元人集见录于当时者,次第复出……法式善备员编纂,十年中三役其事,因得借本,广付钞胥,其书有关系而世罕传本,又篇叶较少易于蒐功者先录之,网罗收葺,积渐而成,阅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装潢为一百七十七册,排列几席间,奕奕然,璘璘然,若与诸公相唯诺揖让于一堂之上。”

四卷,另有宋人集五十九家二百二十七卷、元人集二十二家八十二卷^①。二处所记或略有重复。法式善是今考见各位馆臣中从四库馆录副最多的一位。

8. 誊录

四库馆前后所用誊录在两千人以上,由于官小位低,从四库馆录副、借校事迹多湮灭无闻。今仅考见黄戊从四库馆抄录宋李从周《字通》一种^②。黄戊(“戊”一作“钺”,1750-1841),字壹斋,号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入京应试不第,挑取四库馆誊录。

9. 入馆佐校人员

四库馆中参加纂校四库书的人员,除正式馆臣之外,还有临时入馆佐校的学者,今考有在四库馆抄校书事迹的有丁杰、周广业、朱文藻、吴长元四人。

丁杰是最具声名的佐校人员,乾隆三十六年(1771)乡荐入都下第,“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与朱筠、戴震、周永年、程晋芳、翁方纲、邵晋涵、程瑶田等绩学馆臣均往来甚密。丁氏“在都十年,聚书至数千卷,手写者十二三”^③。傅增湘曾经眼其乾隆四十六年为孔继涵录副之《夏文庄公集》三十六卷^④。又上海图书馆藏其抄校本《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多方》一卷,系其乾隆四十二年从琉璃厂五柳居录副并用四库馆书校订者,详见下文。

海宁周广业(1730-1798)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乡试,入都会试下第,时四库馆亟需校勘人员,争相延致,于是各履所请,凡卷帙经其寓目者,悉成善本。他曾佐校《绀珠集》十三卷,凡改正两千馀字,乃录副藏之^⑤。

①法式善《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卷三该条详列了所抄书目,又云:“借钞官书,不得过多时日,携归又恐污损。是年因誊写七阁书甫毕,书手闲居京师者甚多,取值特廉。余以提调院事,小史亦有工书之人,拣《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而卷帙较略者,分日钞缮,受业生徒十余人亦欣然相助,阅三月而功藏。钜集则不暇及矣。”(第67页)按,法式善云“是年因誊写七阁书甫毕”,其抄上述诸书在此年,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七阁书抄毕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此后四库馆的工作进入尾声,办理查办禁毁书、校改讹误、补写新纂之书等事务,四库馆裁撤约在此年年底,且此后仍在进行覆校工作,故法式善抄写各书,仍多系在办理《四库》期间。此条所云之法氏录副之宋元人集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②《字通》(清乾嘉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黄戊跋云:“《字通》一卷,仅载于《书录解题》。乾隆辛丑,戊充四库馆写书之官,乃获见毛氏影宋本,因录其副,藏之篋中。”

③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十七《丁教授传》,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德清许氏刊本。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夏文庄公集》条载孔继涵题识云:“乾隆辛丑三月丁杰小山自都中抄贴。”(第940页)按,此书清初以来,传世只有四库馆之《永乐大典》辑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亦未收录,此时《四库全书》尚在办理,丁氏必系从馆内录副寄赠孔继涵。

⑤周广业《蓬庐文钞》(民国二十九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本)卷四《书绀珠集后》云:“岁甲辰,客都门,分校续写《四库全书》,中有《绀珠集》十三卷。原本字句错误不可读,校正凡两千馀字,重写送馆,另录四册藏之。王疏雨时为吉士,见而借钞。”

仁和朱文藻(1736-1806)乡试不遇,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都,时任副总裁的王杰延入四库馆佐校馆书,其从四库馆录副之书,今考见宋张铉《南湖集》十卷^①。

吴长元是在四库馆佐校的另一位学者,乾隆间久游京师,公卿大夫争招致校讎秘册。国家图书馆藏宋项安世《平庵悔稿》十四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后编》六卷,有吴氏跋,系其妹婿余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其录副者^②;又藏吴氏池北草堂抄本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有其识语,系其乾隆四十九年从翰林院传抄《永乐大典》本^③。吴氏又曾于乾隆四十六年前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宋谢枋得《诗传注疏》三卷^④;从四库馆分校官孙溶处借得《斜川集》稿本录副^⑤。

10. 馆臣友朋

一些馆臣的友朋利用交游之便,往往从馆臣处借钞、借校馆书,今考见汪启淑与孔继涵二人多有此类事迹。

汪启淑是位与四库馆有密切关系的藏书家,四库馆开,曾进呈书五百二十余种。汪氏与馆臣纪昀、邵晋涵、程晋芳等往来颇多,曾从四库馆借抄《说文系

①张铉《南湖集》卷末朱文藻《书南湖集后》云:“己亥仲冬,客京师,从邵太史二云得见四库全书馆袁辑《永乐大典》中所载张铉诗词,编定为十卷,传抄副本,携归虎坊寓斋。”

②国家图书馆藏吴长元池北草堂抄本,有吴长元手跋云:“是编为余秋室集太史分纂《永乐大典》摘出,时误全集已抄入《四库全书》,遂未经编录。”又云:“庚子秋冬,予寓秋室邸舍,愁病相侵,杜门不出,取案头存稿粘帖成书,手录副本,计《悔稿》、《丙辰悔稿》、《悔稿后编》凡三种,共诗一千四百余首,每稿辑成一卷……俟他日南旋,访求残本校补完善,为书林之一大快。是书出自禁垣,世间希有,当什袭藏之。乾隆辛丑立春日,仁和吴长元书于秋室京邸之疏华馆中。”

③国家图书馆藏吴长元池北草堂抄本,卷首有吴氏朱笔识语:“《永乐大典》纂本。”卷末又题云:“乾隆甲辰中秋从翰林院传写,十月六日校毕。”内钤“池北草堂”、“太初”、“吴长元字丽煌”等印记。翰林院系四库馆场地之一。

④谢枋得《诗传注疏》(清乾隆五十年长塘鲍氏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首吴长元弁言:“宋谢叠山先生《诗传注疏》原本久佚,卷帙无考……今于《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元人《诗经》纂注中采录一百六十四条,历搜诸书,又得一百三十七条,存详去略,编为三卷,只标篇目,不录经文,以脱落甚多也……乾隆辛丑立夏三日仁和吴长元丽煌书于京城嵩氏之东轩。”

⑤《斜川集》卷末(清乾隆五十三年长塘鲍氏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吴长元跋云:“岁在癸巳,朝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特诏儒臣从《永乐大典》中搜罗遗籍。时山左周编修永年于各韵下得先生诗文散片若干首,缘《全书》提要,将外省所进《斜川集》贗本驳去,乃留简不办。继予妹婿余编修集于孙中溶斋偶见稿本,亟以告予,予惊喜过望,借归录副,从《宋文鉴》、《东坡全集》、《播芳大全》诸书考订讹舛,增补缺失,厘为六卷。”

传》四十卷^①。

孔继涵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诏纂《日下旧闻考》,充纂修官。在京期间与戴震、周永年、丁杰、程晋芳、翁方纲、刘涓等交游最密,多假诸人之手借钞、借校馆书。乾隆四十二年春,孔继涵南返奉母,翁方纲称其为“敏捷抄书手,悠闲奉母身”^②,即指此。今考孔继涵据馆书录副之书有十九种:《周官新义》十六卷,见前引《勉行堂文集》卷五程氏该书跋;《春秋会义》十二卷,今藏国家图书馆^③;《归闲述梦》一卷,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④;《元和郡县志》四十卷^⑤;《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新定九域志》十卷;《咸淳临安志》一百卷(存九十三卷)^⑥;《九国志》八卷^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

①徐楷《说文系传》(清乾隆四十七年新安汪启淑刊本)卷末汪启淑跋云:“《通释》、《系传》凡四十卷,考据尤尽精核,然在宋时已多残缺,淑慕想有年。幸逢圣朝馆开四库,淑得与诸贤士大夫游,获见《系传》稿本,爱而欲广其传,因合旧钞数本校录付梓。”汪氏所谓获见之“稿本”,当即馆中校定之《四库》底稿本。

②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六《送孔荭谷农部请养归曲阜二首》其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刻本。

③国家图书馆藏孔氏微波榭钞本,卷末有孔继涵跋:“杜谔《春秋会义》,杨检庵庶常昌霖自《永乐大典》辑出者,内惟僖公、襄公《大典》有阙,中由誊录钞脱三十余条,未补。余借录副……乾隆丙申十二月三十日丁卯孔继涵记。”按,《碧琳琅馆丛书》曾据此孔氏钞校本刊刻,此跋作为序冠于卷首,唯将“乾隆丙申”误作“乾隆丙寅”。

④台湾“国家图书馆”藏该书孔氏抄本,卷末有乾隆甲午(1774)孔继涵手跋云:“右西峰老人《归闲述梦》一卷,抄自天一阁藏书中……乾隆甲午春三月初九日题于敏事斋。”书中钤“孔继涵印”白文方印、“荭谷”朱文方印。敏事斋系孔继涵斋名之一,多见于其手书题记,如其手校《三国志》,每卷后均有校书题记,卷四十八后云:“丁酉八月甲午朔校于敏事斋。”卷五十八后题:“丁酉八月初八日晨起雨窗校于敏事斋。”(《传书堂善本书志》史部《三国志》条引录)。孔云“抄自天一阁藏书”,实即钞天一阁进呈书,《四库全书总目》即据范氏进呈本著录。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浙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十六日汇解三千七百七十一种进呈书入四库馆,范氏进呈书即在其列,可为附证。

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史部《舆地广记》条云:“此孔荭谷所抄浙江经进鲍氏知不足斋本,行款、阙佚均与宋本同,周有香为之校正。孔氏于四库馆各家进本所钞甚富,往往托友人代为校勘,如《元和郡县志》属赵待诏东校,此与《新定九域志》属周有香校也。”据此可知孔继涵从四库馆录有《元和郡县志》、《舆地广记》、《新定九域志》。

⑥《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载该书微波榭钞本并录孔继涵手跋:“乾隆乙未之冬自周书昌编修许得见浙江省经进遗书,寿松堂孙仰曾家钞本,云缺七卷,即从秀水朱氏本录出,假归写之……丙申二月将为装缉,因识得书之由,并录朱跋于上。十八日春阴欲雨孔继涵记。”

⑦《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载该书微波榭钞本并录孔继涵手跋云:“乾隆丙申中秋日抄完。”又录周梦棠手跋云:“路振《九国志》原四十九卷……今散见《永乐大典》中,世家全阙,列传亦阙佚过半。邵二云太史欲编辑之,未克成书。乙未冬,二云南旋,以副本留荭谷农部处。丙申初秋,农部出副本,属予就所存略为编次,得列传一百三十四篇,厘为八卷,以付钞胥,于中秋日钞竟,复校而归之。”

十卷乙集二十卷^①；《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②；《金楼子》六卷^③；《元宪集》四十卷^④；《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⑤；《日涉园集》五卷^⑥；《张于湖集》八卷附录一卷^⑦；《闾风集》十二卷^⑧；《石初集》十卷附录一卷^⑨，均见诸《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有《咸平集》三十卷，见《艺风藏书记》^⑩；

①《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史部载该书微波榭钞本并录孔继涵手跋：“右甲乙二集四十卷，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进鲍士恭家钞本，校勘精审，因俱眷钞……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九月廿六日甲午浦孟孔继涵记。”

②《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载该书微波榭钞本并录孔继涵手跋：“从胡待诏东表兄假得鲍士恭进本，丙申九月初四日抄完。”按，《四库全书总目》即系据鲍士恭家藏本著录。

③《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子部载该书孔氏抄本并录有孔继涵手书题记多条，卷一后题：“丁酉九月初六日雨窗校。”此系其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初校是书。最后一条题记云：“九日辛未自圆明园归，校是书竟，风日甚佳。”初九日校竟。又《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该书条编者云：“此书从《永乐大典》卷一万二百九十一钞出，目录后有‘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二行，盖《大典》所收者元刊本也。”该书传世仅有《永乐大典》本，系周永年辑出，孔氏当系据《大典》辑本录副者。

④《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集部载孔氏抄本并录孔继涵校抄题记多条，其最后一条云：“乾隆乙未闰十月借到刘岸淮涓同年本钞校。钞校于小时雍坊寓。继涵记。”此书系刘涓从《大典》中辑出，孔继涵从其借钞并校。

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集部载该书：“此亦孔荭谷钞《四库》本，以未校，故无题识印记，书根题‘《永乐大典》辑出，赠刑部尚书常山宋景文祁子京集，底本六十四卷。’并各分目，则荭谷手书也。”此书系孔继涵从四库馆抄出无疑。

⑥《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集部载该书云：“此孔荭谷编次本，《四库》本十卷，乃重编之本……上有签，‘是集系先君子乙未年为同年友刘涓岸淮所编也。本编五卷，以未分卷次，抄此副本，遂标目未明。而刘欲以卷多衔功，虽以卷五为卷九，盖欲亦共成十卷也’云云。有‘继涵印’、‘荭谷’、‘昭熿谨藏’三印。”

⑦《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载孔继涵抄本并录乾隆丁酉（1777）校书题记十余条，其中原书目录后孔氏题云：“抄自浙江巡抚三宝进潢川吴氏藏本。”

⑧《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载孔继涵抄本并录其乾隆丙申年（1776）十一月校书题记多条，卷末一条云：“二十七日灯下校。借刘编修芷林《大典》本校钞。”刘编修芷林即刘涓，该书当亦刘涓从《大典》中辑出，孔继涵从其借钞并校。

⑨《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集部载微波榭钞本，录有王士禛跋，又载孔继涵题记多则，卷末一条云：“乙未闰十月二十九日从周书愚同年处钞校。”周书愚即周永年。检《四库全书总目》系据浙江鲍廷博家藏本著录，《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载“知不足斋写本”，并录王士禛跋。鲍氏本当系从王士禛手跋本出，王跋本后归马氏丛书楼，后流入彭元瑞之手。孔氏当即据鲍士恭进呈本录副。

⑩缪荃孙《艺风藏书记》（清光绪庚子辛丑间缪氏艺风堂刊本）卷六《咸平集》条载孔继涵旧钞本，称未有“乾隆丁酉夏五月借周书昌兄两江遗书本钞”一行，收藏印记有“孔继涵印”白文、“荭谷”朱文两方印。按，所谓两江遗书本，即两江总督进呈四库馆遗书，盖周永年校办，孔继涵从其处借钞，《四库全书总目》即系据两江总督采进本著录。

《丹阳集》二十四卷,见《书林掇英》^①。此外,尚有元刻本《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微波榭借鲍士恭进呈本校补^②;《东国史略》六卷附《百夷传》一卷,孔继涵从周永年处借两江总督进呈本校已藏本^③。

11.佚名

此外,尚有确系从四库馆录出之书,而不知谁氏录副者:《东南纪闻》三卷,今藏南京图书馆,详见下文;《雪山集》十二卷,傅增湘曾经眼^④;《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多方》一卷,丁杰曾从琉璃厂五柳居书肆借钞,详见下文;《敏求机要》十六卷,今藏上海图书馆^⑤。

以上所考,除法式善所钞录不易准确统计外,馆臣及其友朋凡从四库馆录副五十九种七十部,校书六种附录一种。馆臣及其友朋等在四库馆实际抄校书数目当远大于此数。此由多种原因造成,除笔者见识之限外,一方面是馆臣所撰跋多不言明系从四库馆抄校,书跋辑入别集时又往往删去撰写时间,如其抄校之书今不传世,便不可确考,如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与沈叔埏《颐綵堂文集》中所载多如此。另一方面是有些馆臣不喜留文字,其书即使存世也难

①魏隐儒《书林掇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载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继涵家抄本,称目录后有:“孔继涵书,丙申八月初八日抄。”(第381页)按,《丹阳集》传世仅《永乐大典》辑佚本,此书当系孔继涵据四库馆《大典》辑本录副。

②《书林掇英》载该书孔氏微波榭校补元建安朱氏与畊堂刻本,并录孔继涵题记:“乾隆三十八年得于琉璃厂书肆文粹堂,后二年乙未三月从周书昌许借鲍士恭家抄本,付栻儿校一过,补缺叶七。孔继涵。”(第111页)此书今藏国家图书馆。按,鲍士恭进呈该书,见《浙江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亦见《浙江集遗书总录》,系知不足斋抄本,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同名者非一书。

③《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载《东国史略》孔继涵校抄本并录其手跋云:“乾隆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大学士两江总都高晋送到遗书,内有汲古阁抄本,于周林汲兄处假校,补一页,并录毛氏跋于右,时四十二年上巳日,孔继涵记于燕京宣武门内圣人府后贝纓衎衎之寿云移。”(第18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十四《雪山集残本跋》云:“首铃李文藻二印,喜其有旧人校笔,更重为南涧收藏,遂以廉值得之。此集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印入《武英殿聚珍版书》,为卷者十有六,此本为初辑时所录副本,非有旧槧可据也。”又云:“顷以聚珍本对勘之,略披一卷,凡触冒时忌处略有改窜,其余字句初无大异,而编次则殊有不同。”(第730页)据此,则此本确系从四库馆录副之本。然李文藻未入四库馆,盖系友人代录者。

⑤上海图书馆藏《敏求机要》抄本,卷内有朱笔校字,末有题记:“乾隆丁酉三月借国子监学政汪如藻所进本抄得一副,廿八日甲午立下校。”卷内铃“孔继涵印”、“荭谷”、“素王子孙”、“鉴湖珍藏”等印记,又书版心下方镌“知不足斋正本”字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即系汪如藻进呈本,此书确系从四库馆所抄,然不知系孔继涵所录否。

以考知,如其亡佚更不可考,周永年所抄书即是如此^①。

即使如此,豹窥一斑,已可见四库馆私家抄校书遍及四库馆各个阶层,并及于馆臣之友朋,可以说四库馆私家抄校书是一个普遍现象。益可佐证者,是馆吏认为此事有利可图,私下抄录出售。上文所举南京图书馆藏佚名录副之《东南纪闻》一书,系邵晋涵旧藏,邵氏手跋云:“此书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不著撰人姓氏,盖宋遗民所纂述也……辛丑夏,馆吏录副本求售,因留之。”邵晋涵不以此为怪,从容购买,可见此系平常事。有些抄本也曾流传到市肆上售卖,上文述及之上海图书馆所藏丁杰抄校本《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多方》,丁氏手跋云:“乾隆丁酉秋,予在京师,从琉璃厂五柳居书肆借抄此卷,乃《永乐大典》本也,快哉!”^②又云:“其年八月,始见官本,遂手自校订,有新抄误者,有旧抄误者,亦有林氏自误者,悉皆改正,不暇分别标识也。编修邹公玉藻,纂修、大总裁刘文正公尚在列,盖癸巳秋从《永乐大典》纂出者。”林氏《尚书全解》阙此卷已久,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乃重现于学者视野,丁氏从市肆录得此书副本,可见四库馆私家录副本已经流传到市肆交易。

二、抄校馆书的途径与方式

《四库全书》规模宏大,纂修日程紧迫,馆臣及其友朋从四库馆私自抄校书,是在不影响馆务的情况下乘职务之便进行的。对于四库馆私家抄书的途径与方式,可根据以上所考及有关史料略做探索。

总裁是四库馆的最高职务,总揽馆务。观上文所考彭元瑞从馆中借抄之五种书,《旧五代史》、《庆元党禁》、《江淮异人录》是《大典》辑本,《盘洲文集》是馆中校定稿本,《东家杂记》是四库馆进呈之副本,可推见其于《大典》辑校、各省进呈书纂校以及分校、提调等各个环节均便于借阅抄校。

总纂总揽《全书》纂修阶段的工作,通过纂修官纂校《大典》辑本、校办各省送到遗书,撮举大纲,办理提要,编纂《总目》。故其对《大典》辑本、各省进呈遗书以及校定之稿本均便于借阅。

总纂以下的馆臣,《总目》协勘官协助总纂官编定《总目》,其借查考之便,短时间借阅编纂中的馆书,尚称便利。而《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负责从《大典》中辑出并编定学术价值较高的佚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负责甄

^①前所考周永年录副本《斜川集》有邓邦述跋云:“封面有林汲山房传抄字,林汲为山东周书昌先生斋名,与邵二云同在史馆,同辑《永乐大典》,一时竟写未见之书。”可见周永年于四库馆抄录书甚多,且广为人知,然今仅考见三种,且均是通过别人记载考知。周氏之文,传世仅后人所辑数篇,桂馥《晚学集》(清道光二十一年孔宪彝刻本)卷七《周先生传》云:“自谓文拙,不存稿,故歿后无存焉。”即言此。其藏书生前半归李调元,与李氏藏书一起毁于火,另一半卒后子孙不能守,多为水漂没,此亦卒后无考之故。

^②丁氏原跋中“书”残损下半,“肆借”残缺,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清道光中蒋光煦刊《别下斋丛书》本)卷一该书条所录丁跋补。

选、校勘各省送到遗书，编定稿本，并撰写提要初稿；武英殿分校官负责查校誊录各员缮写之书，他们借阅馆书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借阅书的权限，从翁方纲与尹嘉铨一札中可以看出：

前日在馆中，见浙江进献书目内有国朝嘉善叶珍所著《小学续编》……乃昨日到馆，取此书观之，系刊本，一函六卷，内、外篇皆有续编，甚可以裨补于先生之书，便欲借来观之。而供事云“此书是励老爷所纂，非其本纂之人，则借不能多时”云云……昨已问该供事，据云“此书早晚要交武英殿抄，如本纂者要看，则尚可借留旬时”云云。与其从弟处需一转手，不如由先生商之自牧更为便耳。^①

此札云“非其本纂之人，则借不能多时”，当系四库馆之规定。盖因办理某书需查考相关之书，故允馆臣短时间借阅非本纂之书。又云“据云此书早晚要交武英殿抄，本纂者要看，则尚可借留旬时”，此言该书纂毕准备交武英殿发抄之时，本纂“尚可借留旬时”，可知四库馆规定某书本纂人员可较长时间的借阅其书。由此可推论校勘、辑佚、分校等办理环节也无不如此。这一层次的馆臣抄校书，多是乘办书之便抄校自己所辑、纂、校等经办之书。核之以上所考，可以得到印证。戴震与邹炳泰是《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戴氏录有其从《大典》中辑出的《海岛算经》、《九章算术》，而邹氏录副书四种，除了《慧山记》是从浙江进呈遗书中录出外，余三种均出自其从《大典》中辑出之本。冯敏昌曾被派校《明儒言行录》，乃录副此书。赵怀玉分校《旧五代史》，录而藏之。周广业佐校《绀珠集》，得以顺利录副。

此一层次的馆臣是各书的直接办理者，多为好古绩学之士，对书籍有特殊的嗜好。他们抄校非本纂、本校之书，往往通过本纂人员来实现。佐校人员及馆臣友朋，尤其如此。上文翁氏建议尹氏直接通过《小学续编》的本纂者励守谦^②借阅该书，即系此意。核之上文所考馆臣友朋抄校之书，若孔继涵录副之书，读孔氏题记可知，多系通过各书本校、本辑、本纂人员周永年、杨昌霖、邵晋涵、刘涓等处借抄。又周永年曾致桂馥一札谈代人借抄《大典》医类辑佚书事，亦可证此论：“宋元人医书，《大典》甚多，不知何者为外间所无？求陈先生速开一单，从荏谷处寄来。此刻王史亭先生现办此门故也。要先开最难得者。”^③他代友人借抄的办法即通过《大典》纂修兼分校官王史亭。王史亭即王嘉曾，时任四库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武英殿提调官与翰林院提调官，因为负责提取两处书籍事宜，故其可以绕过收掌官的管理，所以翰林院提调法式善云：“借钞官书，不得过多时日，携归又恐污损。”提调不必通过本纂者便可私下借阅自己掌管的馆书。而誊录借抄

①《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501页。

②励守谦，字自牧。曾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各省进呈遗书纂修官等职。

③《周永年致桂馥书》，引自《王献唐著述三种》，青岛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馆书,当在其誊录某书时进行。当然,他们也可与其他誊录交流。

借抄馆书分馆内抄校与携归抄校两种方式。抄校书是很费时日的的事情。若程晋芳录副《春秋分记》九十卷,即称“亟命钞胥录之,三月而毕”,味其语气,尚矜其速。馆臣借抄、借校馆书,往往匆匆完成,以便归还原本。故馆臣抄校馆书,除个别单篇小帙外,恐不能在馆中亲自捉笔或交与身边馆吏抄写徇私,这会影晌馆书办理进度;应系携归交私家书吏抄校。前注文引冯敏昌跋其录副《明儒言行录》云“因分校四库书,派校此部,遂于校时随手摘录数百条,以便观省,后因原书未全,究为缺略,因雇书手写成此部,将存家塾,使我子弟他时各得批读”,即此之故。至于馆臣之友朋借抄、借校馆书,就只有借归一种方式了。

四库馆开馆之初,馆务管理较为松弛,馆臣抄校书往往能够较便利的携归抄写。但到了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发生了黄寿龄私携六册《永乐大典》出馆返寓而于途中为贼人所窃之事,乾隆皇帝要求彻底追究、严厉处罚相关人员,并于当月二十五日下诏禁止馆臣将各省所进书籍携往私家^①,随后,又于七月十八日下诏强调此事,制定了纂修领办书之法:

所有翰林院存贮各书,着总裁等交该提调照各省进到书单,造成档册。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如查该纂修仍有违禁私带之事,即回明总裁参劾。若该提调代为徇隐,经总裁等查出,将该提调一并查参。^②

此一办法颇为谨严。不允借归,馆臣个人在翰林院、武英殿等办书地点抄校书,显然要受到书手、空间、时间的限制,对馆臣私自抄校书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周永年借馆书属桂馥为《四部考》,“会禁借官书,遂罢”,殆即此时之事。

但是,这种严格的管理半年后即被打破。前所考孔继涵所借抄各书,有多种是在乾隆四十年所为,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系“乙未三月从周书昌许借鲍士恭家抄本,付栳儿校一过,补缺叶七”;《舆地广记》系“乙未冬,农部假抄两浙进本,出以属校”;《咸淳临安志》系“乾隆乙未之冬自周书昌编修许得见浙江省经进遗书,寿松堂孙仰曾家钞本,云缺七卷,即从秀水朱氏本录出,假归写之”,等等。这几种均系孔继涵借归抄校,其中借校《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距乾隆最后一次发布禁令才半年时间。到了《四库全书》办理的后期,馆内管理更加宽松,故法式善以提调之便得以大量借抄宋元人别集。

①《諭着舒赫德查明遺失〈永乐大典〉实情并各省書籍毋許携往私家》云:“各省所解遺書,辦畢後仍須給還各家,屢經明降諭旨。恐纂修等亦有隨便取携,以致遺失者,亦着及早查明,按單點收館內,毋許携往私家。倘仍不行嚴查,致有舛失,惟該總裁是問。欽此。”(《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16頁)

②《寄諭四庫全書處總裁各省进到遺書及翰林院貯書不許私携出外》,《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27頁。

三、抄校本的特点与价值

观以上所考馆臣私家录副书及据以校勘之本,可以发现它们多系善本及罕见之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永乐大典》辑本。所考各书,除法式善录副本外,《永乐大典》辑本占了三十四种四十三部,包括:《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多方》、《诗传注疏》、《周官新义》、《春秋会义》、《旧五代史》、《东南纪闻》、《唐才子传》、《江淮异人录》、《庆元党禁》、《九国志》、《宝刻类编》、《燕丹子》、《金楼子》、《九章算术》、《海岛算经》、《苏氏演义》、《大隐集》、《南湖集》、《斜川集》、《溪堂集》、《东堂集》、《都官集》、《老圃集》、《蓝山集》、《夏文庄公集》、《丹阳集》、《元宪集》、《宋景文集》、《日涉园集》、《阆风集》、《南湖集》、《平庵悔稿》、《双溪醉隐集》、《雪山集》,占一半以上。法式善录副者也多有出于《大典》辑本者。盖因明代典籍亡佚甚多,至四库馆开之时,这些《大典》辑本绝大多数不见传本,故馆臣竞相传写。《大典》本在编入《四库》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出于避讳等政治原因,馆臣往往加以删改,失去初辑原貌,学术价值受到影响。而这些《大典》辑本录副本多出四库馆初辑本,未经删改。彭元瑞手跋录副本《旧五代史》云:“《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以其注明《大典》卷数及采补书名卷数,具知存阙章句,不没其实也。《四库全书》本如此,后武英殿镌本遂尽删之。曾屡争之总裁,不见听,于是薛氏真面目不可寻究,后人引用,多致误矣。幸抄存此本,不可废也。”^①彭氏云“《四库全书》本如此”实有误,今检文渊阁《四库》本亦已删除出处。又傅增湘谈校勘心得时曾说:“余尝谓宋元人集,凡辑自《永乐大典》者,多苦无旧本可校,然若得当时四库馆钞本,于文字必多所补正。盖馆中初辑出时,犹是《大典》原文,指斥之语不及芟除,忌讳之词未加修改,及经馆臣辑编,则有移易卷第、删落文字(如青词之类删至全卷,防御边夷之属删及全篇及数百字者)及修饰词句之弊,已非本来面目矣。十余年前,曾见法梧门家钞录宋元人集数十家,余曾校十数种,所获佳胜至多。嗣得孔篴谷、李南涧家钞本亦然。”^②其中也有未录入《四库》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书,因有馆臣的录副本才得以广泛流传的,如《斜川集》、《诗传注疏》、《春秋会义》等。嘉道以后,《永乐大典》逐渐亡佚,这些录副本更加珍贵,乃至有从录副本中辑出佚书者,如孔继涵录副本《春秋会义》,孤本流传,光绪间为李邦黼偶然借得,从中辑出唐卢仝《春秋摘微》一卷,刊入《南菁书院丛书》第

①上海图书馆藏知圣道斋抄本《旧五代史》卷末。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第658页。

一集,遂使亡佚数百年之书,重现人间^①。

除了《大典》辑本外,馆臣录副本中颇有一些当时罕见流传之书。今列表如下:

书 名	据以录副之本	纂修《四库》时流传情况
春秋分记	影宋抄 ^②	罕见流传 ^③
说文系传	四库馆校定稿本	元、明无刊本,仅有残宋本见于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④
字通	毛氏影宋本	元、明无刊本,宋本罕见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东家杂记	宋本	元、明未见刊本,宋刊罕见著录
元和郡县志	抄本 ^⑤	元、明未见刊本,主要以抄本流传
輿地广记	知不足斋抄本 ^⑥	仅见残宋本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咸淳临安志	孙仰曾寿松堂抄本	仅见残宋本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慧山记		有明正德刊本三卷本,然清初已罕见著录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鲍士恭进呈家钞本	元、明未见刊本,以抄本流传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四库馆稿本	无流通。录副本出,民间始得流传
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	鲍士恭进呈钞本 ^⑦	元、明无刊本,以抄本流传
芦浦笔记	厉鹗手跋旧抄本	元、明无刊本,宋本罕见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紺珠集	周广业精校本	宋刊罕见著录;明天顺本流传甚稀

①《春秋摘微》(清光绪间刊《南菁书院丛书》本)卷首李邦黼序云:“乙亥之秋,先师钟氏命复校《穀梁补注》,偶假得杜氏澍《春秋会义》钞本……此本为杨检庵昌霖从《永乐大典》编辑而孔篴谷录副者,《四库总目》失收,恐当世无第二本,爰于侍座之暇摘取卢说,编辑成书。”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春秋分纪》提要云:“此本出自扬州马曰璐家,与《通考》所载卷数相合。内宋讳犹皆阙笔,盖从宋刻影钞者。”

③此书之罕见,前引程晋芳《书春秋分记后》即言之。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该书提要云:“明以来其书罕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说文系传》提要云:“《系传》在宋时已残缺不完矣。今相传仅有钞本。”按,此书有残宋本传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著录,曾藏赵宦光家,今藏国家图书馆。

⑤前引《传书堂善本书志》云此书孔继涵“抄浙江经进鲍氏知不足斋本,行款、阙佚均与宋本同”,此书见于《浙江第一次进呈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戊集亦载之,称“写本”。

⑥前引该书周梦棠手跋云该书系孔继涵假抄“两浙进本”,两浙进此书者唯浙江鲍士恭家,《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戊集载之,称“知不足斋写本”。

⑦《传书堂善本书志》史部《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条录孔继涵手跋:“从胡待诏东表兄假得鲍士恭进本,丙申九月初四日抄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戊集载之,称“写本”。

敏求机要	抄本	元、明无刊本,主要以抄本流传
归潜志	抄本 ^①	世所行本皆八卷,此系一十四卷足本 ^②
归闲述梦	抄本 ^③	未见刊刻记载与刻本著录,以抄本流传
咸平集	抄本	元、明无刊本,以抄本流传
张于湖集	抄本 ^④	此八卷本,明崇祯间有刊,但罕见著录
盘洲文集	影宋抄本	元、明无刊本,宋刊罕见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玉笥集	四库官本	此十卷本,明成化间有刊,至清初已罕见著录,主要以抄本流传
石初集	抄本	未见刊本著录,以抄本流传

这些罕见典籍除了《慧山记》、《敏求机要》、《归闲述梦》存目外,其他皆为《四库》著录书,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各书据以录副之本,也多系善本,有的是宋刊,如《东家杂记》;有的系影宋抄,如《春秋分记》、《盘洲文集》、《字通》;有的是地方所进精校善本,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⑤;有的是四库馆校勘精善之本,为外间传本远不及,如《绀珠集》。最令人惊喜的是其中竟有尚未流通仍在修改之中的四库馆稿本《四库简明目录》,赵怀玉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据录副之本刊版,该书始得广泛流传。终乾隆之世,朝廷未刊此书,同治间曾有广州经韵楼、广东书局两刻,均系从赵刻本出。

四库馆私家校勘各书均系据馆中善本,使己藏本得以提高。若上文所言之

①考《进呈书目》(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涵芬楼秘笈》本),进呈此书者凡三家,一见于《都察院副都御史黄交出书目》,二册,盖即八卷本。一见于《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八卷,一本。一见于《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十四卷,四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十四卷本,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考《浙江采进遗书总录》丁集收录此书,作“天一阁写本”,八卷,即范懋柱进呈本。《总目》当误,所据之本当系两淮盐政李进呈本。此书元至大间有孙和伯一刊,明至清初已极为罕见,以抄本流传,《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条谓“当犹从元本传录”,可信。程晋芳传抄此书十四卷,当亦即从此本录副。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归潜志》提要云:“世所行本皆八卷,虽传是楼藏本亦然。国朝郭朝弢编纂金诗,所采录仅及前七卷,知其未见全帙。此本一十四卷,与王恽《浑源世德碑》相合,当犹从元本传录。”

③前引孔跋称该书“抄自天一阁藏书中”,范氏进呈书于乾隆三十八年九月被解进四库馆,此书即在其中。又《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已集载此书,称系“抄本”。

④《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集部《张于湖集》条录孔氏题记:“抄自浙江巡抚三宝进潢川吴氏藏本。”检《浙江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载此书,《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载之,称“写本”,所谓“潢川吴氏藏本”,盖由吴氏流入鲍氏而由鲍士恭进呈者。

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史部载孔继涵录副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录孔氏手跋云:“右甲乙二集四十卷,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进鲍士恭家钞本,校勘精审,因俱眷钞。内有明万历间赵琦美清常校,康熙辛丑蒋绣谷深字树存校,乾隆丁亥鲍廷博倚文校。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九月廿六日甲午浦孟孔继涵记。”

孔继涵从周永年处借校之鲍士恭进呈家抄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孔氏原本系元刊本，尚得补缺页七叶，可见鲍抄本之善。再如《唐摭言》，程晋芳所藏系雅雨堂刊本，此本出于王士禛传抄朱彝尊藏本，而朱藏本系传抄梁清标藏本，流传有绪，较通行之《稗海》本多十之五，但雅雨堂刊本讎校未极精，程氏又得黄登贤进呈四库馆之王士禛抄本对勘^①。

四、抄校馆书的意义

四库馆私家抄校书的盛行与乾嘉学风有密切的关系。四库馆的开设，对于乾嘉学风有很大的推动，章学诚曾云：“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向坟挾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駸駸乎移风俗矣。”^②而乘其便出现的私家抄校书对推动乾嘉学术养成与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乾嘉考据之学，约分训诂、考证、讎校三途，无不以富贮典籍为基础，当时就有所谓“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③的观念。馆臣在四库馆抄校书，无疑为馆臣聚书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私家抄校书的馆臣与其友朋多系乾嘉学术中坚，他们的抄校书活动往往与其治学紧密相关，是其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周永年借钞馆书编撰《四部考》。此书虽然没有完成，但周氏与章学诚往来极密，章氏办《史籍考》盖即受到了《四部考》的启发。再如程晋芳夙有文名，博通四部，尤擅经史，其经部著述有《毛郑异同考》、《春秋左传翼疏》等；史部有《群书题跋》、《桂宦书目》，又有《古学校考》、《后汉书三国志得失考》两文载《勉行堂文集》中；子部有《正学论》七篇载文集中；集部有《勉行堂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四卷。抄、校书正是其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其录副《春秋分记》等恐对其撰《春秋左传翼疏》不无助益。若翁方纲，在乾嘉间于法帖用力最深，于法帖名作《绛帖平》用功甚勤，曾在自藏传抄本书衣题“书须时时检阅考核，不可轻易借出，以荒功力”^④，他用四库馆本《绛帖平》校勘己藏本，当对其学大有助益。翁氏是经学家，传世有《翁方纲经学手稿五种》，私下在四库馆抄书、校书的同时，曾从馆中搜集文献，与丁杰共同补正朱彝尊《经义考》^⑤。由于对经学典籍颇用心，故录副了《春秋分记》。翁方纲也是金石学大家，著有《两汉金石记》等，其于馆中录副《考古图》一书，并非偶然。彭元瑞从馆中抄书，多与其撰《五代史注》密切相关，刘凤诰《五代史记注识语》云：“欧阳文忠公《五代史记》，故尚书彭

①《勉行堂文集》卷二《唐摭言后序》。

②③《周书昌别传》，《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第181页。

④《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第161页。

⑤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清刻本）卷十三《丁小正传》云：“尝相约补正秀水朱氏《经义考》序尾年月……予时在四库馆，日钞数条，归以语君，君亦博采见闻，以相证合。”

文勤公为之补注,公尝语凤诰:‘自十九即有志注是书,随事摭辑,积有岁月,为史官,日获览中秘,为江浙学使,遍访诸藏弃家旧本……’公自乾隆癸卯以后,总裁史馆者二十年,治官撰书无虚日。”^①据此可知,其录副之《旧五代史》即是他补注欧阳修《新五代史》的重要材料之一^②;《江淮异人录》亦是“钞备《五代史记注》”^③。法式善于乾嘉间颇具诗名,王昶称其“为诗质而不羸,清而能绮,故问字求诗者往往满堂满屋”^④,乾隆间,诗歌创作风气向宋诗转变,法式善从四库馆录副宋元人诗百数十家,即是顺应这一风潮的表现。毫无疑问,四库馆私家抄校书对各位学者的学术有不小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乾嘉学术的养成。

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来看,四库馆私家抄校本广泛流传,对推动乾嘉学术发展颇有助益。由于四库馆私家抄校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往往迅速被辗转录副流传。如丁杰从琉璃厂五柳居录副并用四库馆本校勘的《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多方》,友朋争相传抄,至次年春已被传抄了数十本^⑤。馆臣自行刊刻流传录副本的,以赵怀玉刊刻《四库简明目录》最为典型。此外,他还刊刻了《斜川集》。孔继涵则刊刻了戴震的录副本《九章算术》、《海岛算经》。汪启淑刊刻了《说文系传》。而纪昀赠与孙星衍的《燕丹子》,孙氏藏之十数年,先是交给其侄孙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后自己又刻入《平津馆丛书》,遂广为流传。民间学者在流传四库馆私家抄校本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鲍廷博,其所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收录可确考出于四库馆抄校本者达十三种^⑥:《诗传注疏》、《字通》、《金楼子》、《江南余载》、《岭外代答》、《南湖集》、《东堂集》、《溪堂集》、《蒙隐集》、《彝斋文编》、《百正集》、《灞山集》、《逍遥集》。另尚有据四库馆抄校本校勘的《芦浦笔记》一种。鲍廷博在刊刻这些书时往往详加校勘,增辑补遗、附录,在版本方面又有新的提高,《知不足斋丛书》也因此以著录罕见善本而闻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秘笈,一旦化为百千本,为学者治学提供了很大便利,促进了乾嘉学术的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注》卷首,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

②研读彭氏《五代史注》可知,彭元瑞几乎将辑本《旧五代史》的全部内容用于注释《新五代史》,且多是整篇抄入,凡所征引处,径称“五代史”云云。

③前引《江淮异人录》彭元瑞手跋。

④王昶:《湖海诗传》卷三六,清嘉庆八年(1803)三泖渔庄刻本。

⑤上海图书馆藏该书载丁杰另一手跋云:“戊戌春,宝应刘君端林台拱借抄,再校一过,朋侪先后传写者,可数十本矣。”

⑥此统计数字包括鲍廷博从四库馆抄校本辗转录副或据以校刊之本、馆臣代录副本及四库馆佐校人员所录副交与其刊刻之本。